

台北是我們反攻大陸勝利的基地，當然有而且應該有其獨特的精神所在。

有人說：這裏是一個風光美麗，四季如春，而又充滿了人情味的好地方。林蔭大道，寬敞平直，在遠東首屈一指。大廈高樓一年比一年多，市容一天比一天繁華，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進步。

但是也有人說：台北是一個五顏六色最不調和、噪音鬧聲最喧囂的都市；而交通秩序雜亂無章，簡直是無以復加。

更有人說：有些外國人喜愛台北，只是爲了吃喝玩樂，縱情聲色，如此而已。

究竟台北市是怎樣的一個都市，它應該具有那些獨特的精神呢？

遠東各國，特別是那些在西方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地區，開始建設現代化都市的時候，就有人曾竭力加以反對。那個時期，尚未提出所謂公害的問題，他們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基於道德的或者是東方文化的觀點。例如，印度的甘地，他就說過，所有的大都市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是阻止人類精神進步的障礙，而不是促進與提高人類文明的建設。人們不可能既要有大都市的存在，而又不要有大都市的罪惡。因爲，它是孿生兄弟，是與生俱來而不可分割。過去我們在大陸的時候，一聽到說上海的十里洋場，就會聯想到一切毀滅人類幸福的事物。有人稱之爲冒險家的樂園，其實是藏垢納污的所在。

不過，反對儘管反對，大都市在遠東各國還是不斷地出現，而且差不多是同屬於一個類型。這些都市，除了保留了一些各別的地理上的特徵之外，大體上都是殖民經濟的產物，很難發現出來有些什麼足以反映民族精神與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徵。

當然，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西方殖民勢力，已成了歷史的陳跡，我們又是處於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之際，今天我們建設台北市，當然絕不宜再因襲殖民地都市的典型，也不是爲了追求物質的繁華，更不是替冒險家提供奢華逸樂紙醉金迷的場所。關於我們都市建設，應循的途徑，總統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已爲我們指示了正確的方向，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在本年七月十四日寫給台北市張市長豐緒的公開信裏，也提示了台北市九項具體建設重點。本文不是談市政的建設，我想要強調的乃是我們所要發揚的精神，也就是台北市應具有的精神。台北市既然是我們反攻大陸勝利的基地，那麼，我們在這裏所表現的一切，當然是具有代表性，也應該是在艱苦奮鬥中的中國精神之象徵。

過去，我們北伐以廣州爲勝利的基地，抗戰以重慶爲勝利的基地。廣州所代表的是國民革命一往無前的猛進精神。重慶所代表的是抗戰到底的堅韌精神。現在有人主張我們要恢復重慶精神，究竟這一主張的實際含義又是什麼呢？

重慶是抗戰時期的陪都，所謂重慶精神應該就是指的抗戰精神。抗戰時期，我們全國上下一致體認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在這一共同信念之下，我們大家節衣縮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爲了爭取最後勝利而奮鬥。不管物質生活如何的艱苦，我們都甘之如飴。在前線與日寇決生死戰的將士，自然艱苦備嘗；生活在大後方的人，在日本飛機瘋狂的轟炸之下，在血花火光之中，同樣不屈不撓。我們自始至終，堅持抗戰必勝的信心，沒有絲毫動搖。當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人進攻珍珠港以後，英國人封鎖了滇緬路，我們被斷絕了與國外交通的最重要路線，也沒有任何外來的援助，完全憑著堅強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不單

是不畏懼敵人的轟炸，孤軍奮鬥，愈戰愈勇；而且，從無到有，創造條件，克服困難，從事各種生產建設，訓練反攻精兵。我們積極的、進取的、樂觀的、從不氣餒，從不灰心；而全面抗戰到底，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我們現代史上最值得誇耀的重慶精神和抗戰精神。

那麼，什麼是台北精神呢？

本年十月十七日美國洛杉磯市長岳地，在宣佈這一天為「自由中國日」的時候，曾特別指出：中華民國政府自一九四九年遷台以來，在經濟、工業、教育、社會及其他方面，皆獲致了驚人的進步。中華民國自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退出聯合國以來，不僅克服了若干外交上的挫折，而且在經濟及工業發展上仍維持並加快其速度。中華民國儘管遭遇國際情勢所帶來的困擾，仍是處變不驚，並對其本身的前途充滿信心，其人民維護自由與保持堅強的決心，已贏得自由世界的一致推崇。岳地市長和其他國際友人們，所加予我們的許多讚佩之辭，可以證明我們實際上的確已擁有一種可貴的精神。這種精神使我們克服了以往所遭遇的困難，這種精神正鼓舞著我們從今天邁向勝利的明天。不過一般人所看到的也祇是我們已有的外在表現，正像那些批評台北是一個荒淫雜亂的都市的人一樣，而並沒有體認出我們「自由中國精神」、「台北精神」之所以所在。

也許我們生活在自由中國的人，因為習以為常，一時也同樣說不出什麼是我們的精神之所在。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可很快的指出，「台北精神」就是反共到底，復興文化，埋頭建設，堅忍復國的無畏精神。

反共到底，絕對不是一句口號而已。反共到底是我們的信念，是我們從信念中產生行動，從行動中激發力量的泉源。我們建設台澎金馬，建設大台北市，決不是單為了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而已。如僅止於此，那就不可能祇由於這一目的而竟能產生出近乎奇蹟的力量。我們之所以能集結一切力量，百折不撓，處變不驚，是為了反共到底，為了達成消滅共匪，重建中華的神聖任務。我們生活在台灣寶島的中國人，沒有忘記過我們在大陸上被共匪暴政壓迫下的父老兄弟和姊妹，而如何去解救他們乃是我們無可旁貸的責任，學生孜孜攻讀，戰士們磨厲以須，農工人們努力增產，公教人員奮發從公國。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立場是堅定的，因此不管國際形勢如何險惡，決

不能動搖我們反共到底的決心。不管敵人的陰謀詭計如何毒辣，也決不會改變我們必能消滅共匪的信念。我們和共匪是誓不兩立，決無中途妥協的餘地。環顧世界各國之中，還有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能够像我們這樣，始終高舉着反共鬥爭的大纛，不爲勢刦，不爲利誘呢？我們以此為榮，以此自豪，也以此自勉！所有自由中國的人民，都是人同此心，也應當處處表現出這種定力與毅力。我們不單是這樣相信，而且從信心中產生了行動。不但是默默的耕耘，而且大聲疾呼地讓全世界人士都知道：要自救就只有反共到底。

。

現在，共匪在海外發動了一項新的統戰，名之為愛國統一運動。他們說，誰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強大，今日毛共是強大的，所以大家應當擁護今日毛共。他們又千方百計邀約在海外的學人與青年學生們，前往大陸去欣賞他們的「強大」。共匪的這一套說法，完全是慣用的騙術，明眼人一看即知，但是它的企圖却是十分險惡的，就是利用海外同胞熱愛國家的心理，引誘他們入彀。但我們要問共匪果然「強大」嗎？只有一個四分五裂的政權；沒有一項為民利民的建設；老百姓一年的收入，祇够買一輛腳踏車。共匪果然「強大」嗎？為甚麼成千成萬的人民要冒死逃出大陸？為甚麼周恩來不得不冒修正主義的罪名去請尼克森田中訪問匪區，希圖獲得一些工業的產品和技術？共匪果然「強大」嗎？為甚麼口喊反帝而又仍然乞求於資本主義的美帝與日本？不錯，共匪發展了核武器，但那是犧牲了千萬人的生命，只能用來作大陸同胞帶進了核子毀滅的恐怖悲慘威脅之中，更何況共匪這個長了核子牙的紙老虎，如果拿它與美蘇相較，其力量根本不成比例。它們的專制暴虐，它們的欺詐騙術，它們的自相鬥爭與殘殺，使匪偽政權的基礎，一天比一天脆弱，這又如何能算是強大的呢？我們在臺灣的中國人，看的最清楚，我們的反共鬥志，也因此而更加昂揚。

其次，足以顯示我們中國精神的，就是中華文化，我們也必須復興中華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從根掃除共匪邪惡勢力。毛澤東竊據大陸二十年後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我們固有的文化，可見我們文化力量之深厚。文化的涵義很廣，簡單言之，就是人類的生活方式，是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綜合體。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而其基本精神，就是以人文為主，特別

注重道德觀念。我們強調只要能盡己之性（道德），就可以盡人之性（社會科學）、盡物之性（自然科學）。中國人的理想，是從道德學以貫通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我們知道，文化的結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物質的，也可以说是經濟的，包括衣、食、住、行等，這是文化的第一個基礎。沒有衣、食、住、行，就沒有人生，就不會發生文化。中國人在這一方面並不忽略物質基礎，但並不以追求物質、追求財富，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同時也不認為物質可以決定一切，這與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文化的第二個層次，是羣體生活，也就是人與人相處的一種社會生活，比如我們處家庭、處社會、處國家的一套基本道理，都在這一範疇之中。中國文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以個人為起點，而以天下為極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個方程式，看來簡單，却包含了以道德為骨幹的中國文化的全部精神。具體的說，談到個人，我們強調君子之風：「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其最高理想，就是止於至善。這種個人修養，也發展為國家在國際間的道德準則，舉廢國，繼絕世的王道精神。我們須知，其中就涵蓋了中國固有文化中羣體關係之大道。我們人人做到了，就無愧於共匪來破壞我們的家庭，毒害我們的社會，滅亡我們的國家。

文化的第三個層次，是心靈陶冶的生活。文化發展到第三層次，就有

文學，有藝術，有哲學，有宗教信仰。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但是中國的文學、藝術與哲學，在世界文化中，可以說無出其右。一般人也許想到文學、藝術與哲學，這只是文學家、藝術家與哲學家的事，與多數人無關。殊不知文學的作品，藝術的創作或演奏，是大家都能閱讀欣賞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的提示，對一般人更具有無限鼓舞與啓示的作用。我們能培養這方面的興趣和領悟的能力，對於我們做人處世，處變若定，均極有裨益。

總結來說，文化的養育，存在我們日用常行的生活之中，而且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與我們的思想、觀念、行動密不可分。我們習慣於這種生活，我們熱愛這種生活方式，我們珍惜文化的傳統，我們決心發揚這種文化精神，這就是反共產，反奴役，爭自由，爭生存的巨大力量。要緊的是我們必須體察中華文化不是徒託空言，而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現實的一切，相結合在一起的；決不是在生活和現實之外的空中樓閣。

第三是埋頭建設。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為了改善國計民生，為了儲備復國建國的戰力，我們必須加緊建設、埋頭建設，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臺致力於各項建設，成果之豐碩，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而我們之能保持如此長期安定的環境，得以從事建設，也是前所未有的。例如：以民國卅五年為基數，教育方面，學生的人數，到今年增加了七十倍。工業方面，工業生產指數增加了六十倍。衛生方面，男子的平均壽命，由四十一點一歲，提高到了六十六點六歲；女子的平均壽命，由四十五點七歲提高到七十一點一歲。國民的平均所得也增加了六倍，每年每人可得三百七十五美元。我們今年的對外貿易額，將超過五十億美元以上。單舉這幾項數字就可以證明這廿多年以來，我們的建設是如何的進步。而這些建設都是在廿七年以前滿目瘡痍，民生困苦，物資缺乏，工商凋敝，可以說是在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也因為有了這樣驚人的成就，乃使我們在國際間贏得了重要的地位。談到建設，自然包括心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各種建設，但是最為一般人所關切而又容易受人注意的，莫過於經濟的建設。經濟如果不能發展，勢必嚴重影響政治的進步、社會的安定，和士氣民心的振奮。所以說臺灣的建設成就，乃是我們反攻復國的保障。最近，行政院蔣院長指示我們的經濟建設，必須與外交、教育和財政相結合，這正是我們大家努力以赴的另一階段的主要目標。

我們說埋頭建設，就是說無論遭遇何種挫折，我們還是要按照預定的計劃，向著預定的目標邁進。最近一年以來我們在外交上雖曾遭遇到一些顛挫，但是我們的經濟建設和對外貿易不但沒有因此而衰退，此種外來刺激反而更激發著我們全國上下獨立自主的精神，力求擺脫依賴他人的經濟關係。經濟的發展是漸進的、踏實的，不可能立竿見影。因此凡是重大的決策先要照顧到我們本身經濟的發展，在我們還沒有能建立鞏固的自有的基礎以前，有

時還須要作短時期的忍耐。這種忍耐可能是痛苦的，但是是有價值的。我們說埋頭建設，就是要信賴政府所決定的政策，在政府堅定的、明確的政策領導之下，我們參加建設工作的人只要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埋頭建設。所有的人民也都要了解並且擁護政府的政策，支持建設的工作，決不讓任何人來破壞我們的經濟建設。能够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握住自己，愈是在困難中，愈能昂揚我們的鬥志，愈是在大風大浪之中，愈能團結我們的力量，這也就是用心理的建設和社會的建設來支持我們經濟建設的成功。

四是堅忍復國。看一看當前的國際情勢，在赤禍蔓延，姑息逆流囂張的時候，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能夠逃過禍害；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不戒慎恐懼而可苟且偷生。其中最接近共產禍源的地方，固然是格外危險，例如東北亞的大韓民國，已宣佈進入了緊急狀態。東南亞的菲律賓也頒佈了戒嚴令，越南則在連年苦戰遍地烽火之中，還要飽受國際政治壓力的摧殘與煎熬！而遠在北美洲最稱富強的美國，亦不能例外，而且正接受着史無前例的挑戰。真是匪禍不除，無處可以爲家，亦無處可以立國！我們和共產匪徒鬥爭最久，我們從失敗的教訓中，最能了解只有發奮圖強，纔能死裏求生，轉敗爲勝。

很冷靜地來分析共產侵略者的實力，它們內部危機之嚴重，實際已是山窮水盡，決無稱霸稱雄的憑藉。舉例而言，它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早已破產，匪、俄雙方即互相指對方爲修正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的叛徒，至於其他附庸則

更無建立理論之可言與可能。它們的團結也早已被破壞了，俄軍的主力，正部署在而且劍拔弩張對準着共匪的邊境。它們的經濟，就從來沒有免於饑餓，蘇俄現在嚴格限制人民的麵包消費量，共匪今年需進口小麥達四百萬噸。說到他們統治機構的權力鬥爭，那更是一場比一場兇狠。在匪俄暴政統治下的人民，如何能滿意這樣的政權，又如何會擁護它們從事國際的戰爭？可惜的是，我們民主國家過於畏戰苟安而又被匪俄的色厲內荏所詐騙，以致不肯以實力相抗衡，一味謀求表面的苟安，但姑息適足以養奸，遂演變成今日匪俄一時的跋扈囂張。

在世界地圖上，我們臺灣金馬誠不過彈丸之地；我們和共匪所竊據下的大陸，則不過是一水之隔，然而二十年來，却屹立如山，而且屏障了西太平洋的安全，也牽制了共匪六十萬以上的陸軍，半數的海軍和整個的空軍！因爲我們人人穿上了反共的思想武裝，個個知道奮發求生，有我無敵。

以上所舉四點：反共到底，復興文化，埋頭建設，堅忍復國，我想可以稱之爲臺北精神，可以作爲「臺北精神」的內涵，其實也就是我們一貫革命精神之發揮。

臺北精神是繼承廣州精神重慶精神而來的另一階段的發揚，其中有若干是舊有的可貴的傳統，但另有一些新的任務則是開啓新時代的無可旁貸的職責。相信國人必能同持此一精神，相互勵勉，共策進行，以達成國家與歷史所交付我們的任務！

日建交與亞太局勢

陳紹賢

日本各在野黨派和大衆傳播機構，作爲其打擊自民黨政府的工具。它對最近一屆的佐藤政府所施的顛覆手段，尤爲毒辣。今夏佐藤辭職，自民黨內競選總裁，主流派福田失敗，拉攏反主流派的田中勝利，繼任首相。毛共統戰戰略的施展，於此也見其效。

毛共對日策略的改變來得非常突然。剛在去年夏間，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 (James Reston) 和美國的親匪學生團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還對他和他們發表談話，攻擊佐藤政府在進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到了田中政府着

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之後，毛共加強對日滲透。它的統戰戰略，以支助

九月廿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周恩來發表聯合聲明，宣佈自即日起「建交」。這是日本與毛共正式勾結的開端，其帶給世局——尤其是亞太地區的衝擊已見嚴重。這種勾結的背景、實質和影響，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